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5.012

## 《红楼梦》经济叙事及其意义生成

孙宗美<sup>1</sup>, 刘金波<sup>2, 3</sup>

(1. 华南农业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42; 2.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3. 武汉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红楼梦》意义世界的生成, 与其对经济活动的讲述大有关系。经济活动作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 在世情小说中自然而又隐性地自成一套叙事系统, 为文本植入了特殊的意义。以经济视角看《红楼梦》叙事, 其人物与经济相关的行为, 如收入、分配、理财与消费等, 均值得做深入文本内部的细究和详察, 作为财富象征的金银也成为携带意义的符号。不正常的收支、奢靡腐朽的生活是以贾府为核心的四大家族败落的主因, 其折射出贵族地主阶级崩溃的必然。月钱、年物等的分配叙事在小说中常常浮现, 其并非无关紧要的“闲笔”, 实则暗伏各种欲望之下的人物关系和家庭内部矛盾。王熙凤和贾探春在持家理财上的策略异趋, 反映出不同的人生追求, 也凸显了“末世”毁灭一切价值的悲剧意义。人与物、欲望与幻灭的关系, 既是文本最深层的隐喻, 也是《红楼梦》经济叙事最重要的寓意所在。

**关键词:**《红楼梦》; 世情小说; 经济叙事; 意义生成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2)05-0095-09

**引用格式:** 孙宗美, 刘金波. 《红楼梦》经济叙事及其意义生成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5): 95-103.

### The Economic Narration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Its Meaning Generation

SUN Zongmei<sup>1</sup>, LIU Jinbo<sup>2, 3</sup>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2. Media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3.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meaning world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r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s a necessary component of family and social life, economic activities naturally and implicitly forms a narrative system in the world novels, implanting special significance into the text. Looking at the narr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y, not only the characters' behaviors related to economy, such as income, distribut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nsumption, are worthy of in-depth

收稿日期: 2022-03-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晚清民国传统文章学研究”(21YJC7510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礼记》文化关键词流变与传播研究”(20YJA860006)

作者简介: 孙宗美(1981—), 女, 四川冕宁人, 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刘金波(1968—), 男, 湖北大悟人, 武汉大学研究员、编审, 博士, 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

study and scrutiny within the text, but also gold and silver, as a symbol of wealth, become a symbol of meaning. Abnorm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extravagant and decadent life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the four big families with the Jia family as the core, reflecting the inevitable collapse of the aristocratic landlord class. The distribution narrative of monthly money and annual things often appear in the novel, but it is not an insignificant "idle writing". In fact, it hid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and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family under various desires.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Wang Xifeng and Jia Tanchun in household finance reflect their different life pursuits and highlight the tragic significance of destroying all values in "the end of the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ings, desire and disillusionment is not only the deepest metaphor of the text, but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implication of the economic narration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Key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orld novels; economic narration; meaning generation

作为一部伟大的写实作品,《红楼梦》围绕宝、黛、钗、凤等主要人物,以贵族家庭生活事件为中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脉络,写尽了人情、人性与人世,展现出18世纪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由于《红楼梦》主要围绕家庭生活来展开故事,其中有不少有关经济的描写,如秦可卿出殡与元妃省亲等大事的支出耗费、乌庄头的账单、探春兴利除弊的故事等。这些都是较为显性的情节,较为隐性的有王熙凤的放贷、贾府上下月钱年物的分配等。从叙事与意义的角度看,这些与“经济”有关的叙事具有某种超越其自身本意的意义。从文学着眼,重新审视《红楼梦》有关经济的内容,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作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叙事艺术及思想内涵的理解,也有利于拓宽《红楼梦》研究的视野。

俗语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离不开经济,经济就是一种“生活”。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中的家庭生活都不可能没有经济因素和经济活动的存在。就《红楼梦》这样带有写实意味的小说而言,其有关经济的内容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可供历史学家作为清代社会生活史料的参考和佐证(尽管小说不是历史),还可以从文本意义显现的角度进行解读。这首先是因为,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的叙事文学天然地以反映现实、显现“意义”为第一要务,而经济叙事作为生活叙事的一部分,深刻地反映了家庭内外的矛盾,呈现了生活丰富立体的面相,是“意义”的重要载体。其次,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延伸了人的自我。人在处理金

钱、财货上的态度、方式,最能凸显其欲望、心理、情绪和某方面的性格特征。因此,把人物放在经济“事件”中来描绘,常常能达到很好的写人效果。

需要强调的是,《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任何角度的研究都应该服从于文学性的需要。尊重文本,拥抱作品的文学性,应是《红楼梦》研究最适宜、最恰当的取径。20世纪“红学”兴旺,但也一度存在文学在“红学”中缺位的问题。俞平伯、刘再复等学者都有“多从文学、哲学着眼”“红楼归位”<sup>[1]</sup>的学术倡议。对《红楼梦》经济叙事的研究,并非以文学为经济学做注脚,而是从叙事的角度抓住文本表现最突出且意义涉及面较广的经济叙事展开深入论述。

### 一、贾府的入不敷出、奢靡腐败与贵族地主阶级崩溃的必然

著名学者李辰冬先生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红楼梦的世界》一文第五部分专列“经济”一节,他在此节的最后得出结论:“荣府之所以衰败,因为工作的人太少,而消费的人太多,然又不能节省以致坐吃山空。这是一个家室衰败的原因,扩而论之,也是一个国家衰败的原因。”<sup>[2]534</sup>以此作为引子和铺垫,我们可以展开更为深入的分析。

贾府的衰败是《红楼梦》的叙事主线之一,关乎小说整体的结构安排,而大家庭的衰败首先最直接地表现在经济上。小说中,许多有关经济的叙事都涉及贾府的财务危机和经济矛盾,其线索在文本中隐约可寻(见表1)。

表1 《红楼梦》贾府经济衰败叙事线索

回目	贾府经济衰败(入不敷出)叙事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冷子兴向贾雨村叙宁荣两府的“萧疏”及“内囊尽上”。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凤姐对刘姥姥说家境:“外头看着虽是烈烈轰轰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说与人也未必信罢。”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乌庄头除夕交租,贾珍贾蓉议家计,谈及“这一二年倒赔了许多”“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并提及凤姐与鸳鸯商议偷贾母东西当银子事。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平儿向凤姐细说探春理家事,凤姐述家计艰难:“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有大小事儿,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黛玉与宝玉议探春理家,黛玉说:“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贾敬丧事,管家俞禄向贾珍汇报欠棚杠孝布人工费共六百零十两,贾珍命贾蓉、俞禄各处挪借。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尤二姐死,贾琏向凤姐索银办丧礼,凤姐借故推托,透露“家里近来艰难”,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鸡儿吃了过年粮”,“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百两银子”。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贾母生日后,为预备各处送礼,贾琏向鸳鸯商议偷运贾母金银家伙暂押;凤姐与旺儿媳妇叙帮王夫人当物备贾母生日礼;夏太监遣人敲诈,凤姐以金项圈抵押四百两银子;贾琏述前日周太监索要一千两银;贾琏与林之孝议家道艰难。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贾琏向凤姐述与鸳鸯议“借当”事被邢夫人得知,邢夫人借机索要二百两银子过中秋,凤姐以金项圈抵押银子打发。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谏	尤氏到贾母处用饭,只剩下人用的白粳米,贾母询问其故,鸳鸯道:“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儿富余也不能的。”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黛玉病重,周瑞家的替紫鹃向凤姐提出“支用一两个月的月钱”,凤姐叙家计艰难:“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总绕不过弯儿来”,周瑞家的述及外面的传言及“歌儿”:“宁国府,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吃不穷,穿不穷,算来总是一场空。”凤姐说:“这些话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咱们一日难似一日,外面还是这么讲究。俗语儿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况且又是个虚名儿,终久还不知怎么样呢。”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冯紫英到贾府推销母珠等四样洋货,总价两万两银子,贾政财力无力购买。贾赦也说:“我们家里也比不得从前了,这回儿也不过是个空门面。”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贾赦、贾珍获罪去职抄家。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灾	贾政问贾琏“重利盘剥”事,又查支用账目,方知“库上无银”“尚有亏空”“虚名在外。”
第一百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贾母向贾政询问家底,贾政如实述亏空,贾母方知实情,分散余资。

可见,或隐或显的经济状况讲述几乎贯穿《红楼梦》全书,贾府的经济困境不仅本身是小说情节的一部分,也成为支配其他情节走向的巨大力量。“入不敷出”成为作者反复交待的特定信息,透露出贾府日渐萧疏的财务状况,勾勒出贾府败落的轨迹。《红楼梦》前五回在全书结构中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其既是介绍悲剧轮廓和主要人物生活遭遇的总纲,也是牵涉后文诸多情节、事件的引线。因此,前五回的叙述与议论,是开

启《红楼梦》艺术宝库的一把钥匙。其中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就通过冷子兴之口,提纲挈领地指出宁、荣两府走向衰败的征兆和趋势:“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sup>[3]26</sup>寥寥数语便深刻揭示了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可悲情状。之后,自第五十三回“乌庄头交地租”至第一百零七回“贾

母散余资”则以“草蛇灰线”的方式描绘出贾府拮据亏空以至崩溃的经济状况。杨义先生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它叙事的每一点都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中蕴含着特殊意味的一点，它所蕴含的意味、意义或哲学，都最终在结构的完整性中获得说明。”<sup>[4]</sup>也可以说，作者曹雪芹正是欲借上述总体悲剧性叙事以及各种走势贯通的过程叙事，折射出《红楼梦》时代贵族官僚地主阶级衰败的必然性。

贾府经济上的“出多”，主要源自三个方面：极大的日常消耗与浪费、内部腐败和外部的敲诈勒索。

首先，人口众多，事务繁杂，日常支出除主子、奴才的吃穿开支外，还有月钱、年例、姑娘们的脂粉钱、宝玉等学里点心笔墨钱等。据邓云乡先生粗略推算，宁、荣两府上下三四百人，一年所有日常开支总计约两万两<sup>[5]</sup>。再加送礼、孝敬宫里、修工程、种花木、养车马……汇总起来，当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此外，秦可卿出殡、元妃省亲等大事的支出耗费更难以计数。如第十六回贾蔷下姑苏“聘请教习，采买女孩子”，银子一支就是三万两，“置办花烛彩灯并各色帘栊帐幔”也要两万<sup>[3]212</sup>。小说虽未具体描述修大观园的花费，但从第十七至十八回描绘豪华的省亲盛况及元妃“默默叹息奢华过费”<sup>[3]237</sup>，临别叮咛“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sup>[3]250</sup>，也大致可判断用的钱不是小数目。

正常开支尚且不菲，贾府各项事务的奢靡浪费也是《红楼梦》着意叙事的内容。其中又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日常的铺张浪费。仅以吃喝方面为例，如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作者借这位乡下贫寒老妪之眼描述王熙凤用过饭的餐桌，“碗盘森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sup>[3]197</sup>；第三十五回，宝玉病中想吃的一道“莲叶羹”要精致银模子、几只鸡才能做出来，令薛姨妈惊叹“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sup>[3]464</sup>；第三十九回，荣国府一顿螃蟹宴花费二十多两银子，刘姥姥叹：“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sup>[3]522</sup>二是特定人物荒淫腐朽导致的奢华靡费。相关叙事一方面透露贾府触目惊心的耗费，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特定人物的性格特点。如第十四回，秦可卿出殡，“一应执事陈设，皆系现赶着新做出来的，一色光焰夺目”<sup>[3]189</sup>，宁

府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sup>[3]190</sup>。而在前一回，小说专门交代了秦可卿死后，公公贾珍因与其有不伦私情，如丧考妣，“哭的泪人一般”，说出“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这样的话，更在其葬礼上“恣意奢华”。不仅不惜重金购来“非常人可享”的楠木棺材，又为儿子贾蓉豪掷一千二百两银子捐官<sup>[3]171-174</sup>。贾珍之“荒淫无耻”由此可见一斑。又如，“兄弟、侄儿、儿子、孙子一大群”<sup>[3]613</sup>的贾赦欲纳鸳鸯为妾不成，最终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收在屋内作罢；又为强买石呆子的古扇，扬言“要多少银子给他多少银子”<sup>[3]644</sup>。这两件事均涉及致人死命之威胁，贾赦之“骄奢暴佚”可见一斑。又比如贾琏与鲍二家的私通，事败后以银子打发了事，而且是“公费买单”：“又命林之孝将那二百银子入在流年账上，分别添补开销过去。”<sup>[3]596</sup>

其次，严重的内部腐败也是掏空贾府“家底”的又一根源。《红楼梦》中涉及家庭内部经济腐败的叙事，主要围绕王熙凤、贾琏夫妇展开。第十六回，元妃省亲事定，贾琏乳母赵嬷嬷托凤姐为自己的两个儿子谋差事，恰逢宁府贾蓉贾蔷来汇报兴造省亲别院事，并告知贾琏夫妇贾珍欲派贾蔷下苏州聘教习、采买女孩，希望获得贾琏的认可（迎接贵妃省亲是宁、荣两府共同的事）。贾琏起初对贾珍的安排甚感诧异且明显流露不满，他“将贾蔷打量了打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事虽不算甚大，里头大有藏掖的。”这时，“贾蓉在身旁灯影下悄拉凤姐的衣襟”，要凤姐帮忙，凤姐会意，替贾蔷说了不少好话<sup>[3]211</sup>。贾琏最终软化了态度，不再反对了，但这种同意是要求回报的。凤姐趁机将赵嬷嬷的两个儿子塞给了贾蔷，要他带上他们一同去办差。贾蓉、贾蔷不仅接受了这样的要求，更主动向贾琏夫妇表示要顺便“孝敬”东西。琏、凤二人虽故作正经地一口回绝，但贾琏却留下一句话：“我短了什么，少不得写信来告诉你，且不要论到这里。”<sup>[3]212</sup>根据其后双方商议银钱预支的细节来看，此项差事的确是大有油水可捞的“美差”。小说里虽没有提及贾蔷是否先行贿赂了贾蓉或贾珍，但以珍、蓉父子无所不为的品行，没有好处的“助人”似是不可能的事。

贾芸和贾芹是《红楼梦》着意对照刻画的两个家境穷困的贾府远支子弟形象，作者也主要是

通过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活动来刻画其形象的。第二十三回,贾芹靠母亲周氏向王熙凤说情,谋得管理家庙和尚道士的差事,随即便到银库预支了三个月的供给“白花花二三百两”。这笔进入贾芹囊中的“公款”就成了他可以任意支配、挥霍的“私财”。其后,从贾珍嘴里可以得知,贾芹不仅克扣和尚的分例银子,还在家庙里“为王称霸起来,夜夜招聚匪类赌钱,养老婆小子”<sup>[3]722</sup>。与贾芹不同的是,贾芸工于谄媚、急于钻营,靠自己谋到了差事。他通过借钱向凤姐行贿走通了门路,得到了在大观园种树的“肥缺”,立刻领到了二百两银子。有了银子的贾芸先还了欠倪二的钱,又拿出五十两去买树,扣除种树的人工费,肯定还有不少剩余可以中饱私囊。这两个“边缘”的贵族家庭子弟尽管有着两种相反的性格作为,但在托关系谋差事、借办事之机侵吞“公中”钱款方面却是一致的。

第三,外部权势的敲诈勒索应该也是贾府的一项不小开支。第七十二回就写到宫里的夏太监因买房遣人来“借钱”。这里的“借”,其实就是勒索。据贾琏的抱怨和小太监转述“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sup>[3]1001</sup>,可知这样的敲诈已不是一次两次,并且除了夏太监,还有周太监……这些太监之所以能公然频频向豪门贵戚索贿,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最接近封建政权的最高层,最容易形成特殊势力。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左右政治、控制朝政的例子屡见不鲜。《红楼梦》第十三回,贾珍通过大太监戴权花了一千两银子,给贾蓉捐了一个“五品龙禁尉”。捐官不找户部官吏,却找太监,这就足以说明所谓“康乾盛世”“捐纳”的黑幕;而且这个太监竟然肆无忌惮地公开卖官鬻爵,足见其权势和派头之大。

贾府各种有形无形的开支如此巨大,而收入却有限无增,甚至“不及先时”。根据《红楼梦》的描述,贾府的收入主要是世袭俸禄、皇帝恩赏以及庄地产业地租。即便有贾政在朝为官,但其官职不过是员外郎升任郎中,从五品至正五品,收入也十分有限。因此,一大家族日常消耗排场既大,又无法缩减;子弟虽多,却几乎都是只会浪费、不事或不擅管理的纨绔;加之内部严重腐败,外有敲诈勒索,其结果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所以贾氏便不经抄家,也可渐渐的贫穷下来。”<sup>[6]</sup>

尽管《红楼梦》后四十回显示,贾府的败落最终是由于抄家所致,但前八十回集中表现的根源于内部腐朽和贪污的家庭经济收支矛盾也是贾府衰败的主因。

作为社会历史悲剧的《红楼梦》,它对社会历史的反映既是形象的,又是折射式的。《红楼梦》成书约在清代乾隆年间,其所反映的时代大致是清康熙至乾隆初年——正值大清帝国文治武功的时代。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黄金时代”,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上同类家庭的缩影,以贾府为中心的四大家族由于内部的分裂和腐朽,虚有其表,最终纷纷败落。曹雪芹把握到这一时代的社会问题并通过小说形象地表现,充分揭露了四大家族所代表的贵族官僚地主阶级衰败的必然规律。因此,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通过一个家庭写一个时代社会,实际上,作者曹雪芹用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盛与衰败,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来作清朝康雍乾时代统治阶级的镜子。这正是作者伟大的成就。”<sup>[7]126</sup>

## 二、两种管理方案与“末世”的回天无力

贾府“入不敷出”“内囊尽上”的叙事,映照出贵族地主阶级崩溃的必然,也勾勒出一幅“忽喇喇似大厦倾”的“末世”图景。贾府的老爷少爷们或冠冕堂皇、称述孔孟,或骄奢淫逸、无所不为;太太奶奶们或不闻不问、只顾及时行乐,或秉性愚弱、贪财自得……总之,如冷子兴所言:“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sup>[3]26</sup>耐人寻味的是,“束带顶冠”的男子们昏昏如醉,毫无忧患意识,反倒是女流之辈中有人觉察到危机的存在,如探春、王熙凤和秦可卿。秦可卿早亡,唯王熙凤和探春能对现实有所作为。在曹雪芹的笔下,她们的选择与做法虽各不同,却都无法阻挡贾府濒于灭亡的趋势。“末世”预示了所有人的命运。在此之下,个体的任何行为都是徒劳的,悲剧的结局无法避免。

王熙凤作为荣府二门内的实际管家人,心里最清楚荣府日渐拮据的经济状况和败落的势头。《红楼梦》第六回写她对刘姥姥诉说荣府的现状“大有大的艰难去处”<sup>[3]101</sup>,虽是客气的套话,但也确实是真话。其后她也在不同场合向不同人透露过

“家道艰难”。第十三回,秦可卿临终托梦王熙凤,劝她要为贾府后来衰败早做打算,提出“可保永全”的法子<sup>[3]169-170</sup>。从创作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作者借秦可卿之口发出贾府将要“乐极生悲”“树倒猢狲散”的预兆;但秦可卿眼中“脂粉队里的英雄”王熙凤,并没有采纳她的建议,也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方式应对危机。第五十五回,凤姐向平儿发牢骚:

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虽然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宽放;二则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有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sup>[3]758</sup>。

可见,“省俭”和维持现状是王熙凤管理方案的核心,但我们不能因此一味地苛责她应付表面、因循苟安,因为王熙凤谨守的“老祖宗规矩”并非她个人的意志,而是贵族家庭出于虚荣和面子,长期保持奢靡消费的惯性使然。用贾母的话说,就是“‘居移气,养移体’,一时下不得台来”<sup>[3]1444</sup>。同时,这也充分暴露了宗法专制社会中,所谓“老祖宗规矩”的无上权威。尽管如前所述,王熙凤私下也假权舞弊,实是“这一个家庭的贪污盗窃弄权营利的首脑”<sup>[7]133</sup>,但排开个人行迹不论,墨守成法的社会风尚如此,作为贾府孙媳妇辈的她既无力也无心与之抗衡。

事实上,她也曾表达过“改革”的意图,但都毫无例外地不了了之。一次是在第七十四回,因大观园绣春囊事发,王夫人前往问罪,她不仅很委婉地洗刷了自己,并且顺势提出裁革丫头的建议,理由是“保得住没有别的事”和“省些用度”。王夫人听后,却以裁革丫鬟会令大观园姐妹们失了“千金小姐的体统”为由推诿过去了<sup>[3]1025</sup>。虽然她声称宁可自己省些也别委屈了姑娘们,但也只是口头说辞,根本不可能实行。另一次是第九十二回,冯紫英到贾府兜售母珠,贾政让贾琏把东西送到贾母处请邢、王二夫人凤姐都来看。王熙凤借机说出了秦可卿托梦的建议:“东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里有这些闲钱。……我已经想了好些年了,像咱们这种人家,必得置些不动摇

的根基才好,或是祭地,或是义庄,再置些坟屋。往后子孙遇见不得意的事,还是有点儿底子,不到一败涂地。我的意思是这样,不知老太太、老爷、太太们怎么样。”<sup>[3]1280</sup>尽管在场的贾母与众人都说这话说得有道理,但贾琏却抢白她:“老太太还没开口,你便说了一大些丧气话!”<sup>[3]1281</sup>王熙凤的建议再一次没有了下文。王夫人、贾琏等自然不会有警惕意识和长远打算,他们最在意的只是“面子”和眼前的存在,而王熙凤再有聪明才干,也只不过是上层意志的执行者。王增宝等6位学者在1944年撰写的长篇论文《红楼梦与中国经济》中就指出:“《红楼梦》中,提到面子之处甚多,一层一级中,完全以面子来维系。宗法社会发展到了末期,已经失去它原始的意义了,它变成虚伪的、无用的机构,反而桎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sup>[2]952</sup>

在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中,只有王熙凤和探春的判词出现“末世”一词。《红楼梦》第五回,探春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sup>[3]76-77</sup>王熙凤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sup>[3]78</sup>显然,这也是曹雪芹惯用对照写法塑造人物的手段之体现。他有意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对照说明:在“末世”之下,行将没落的贵族家庭中才能出众、不同凡响的女子会有两种正相反的性格和作为。

与王熙凤相比,胸怀抱负、事事明白的探春显然更正派且富有“改革”的魄力与勇气,尽管她并无羽翼也不会玩弄权术,这一点从她的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也能看出。《红楼梦》从第五十五回到五十六回用了较大篇幅正面描写探春代理治家与推行经济改革“新政”。这既是探春最光彩照人的一幕,也是整部小说的华彩篇章。此前第二十七回已通过她攒钱托宝玉买东西以及替宝玉做鞋的琐碎小事,透露她与亲生母亲赵姨娘的矛盾以及她在经济方面的留心 and 独立意识,为其后面的治家行为做了铺垫。这位尚未出阁的少女胸怀抱负不得施展,当着赵姨娘和众人的面,她不无痛苦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sup>[3]752</sup>为了给她提供发挥才能的机会,小说刻意做了“安排”:王熙凤生病,

一时不能恢复,王夫人命李纨为主、探春协助,后面又委托了宝钗,三人共同代理管家。尽管探春并没有得到独自理家的使命,也明知不是长期行使职权,但她还是在江河日下之际,奋臂振起做了改革的尝试。她果断坚决、大公无私地应对了吴新登媳妇的故意刁难,迅速立威;她提出免了宝玉、贾环、贾兰三人上学的点心、纸笔费用,也取消了大观园姑娘们每月重复支出的头油脂粉费。她还参考赖大家花园的管理办法,建议将大观园也委派承包给园中服役的婆子媳妇管理。这样,她们除了供给姑娘们头油脂粉香纸和瓶花、鸟食外,还能自享盈余。这样不仅大观园出产的花菜稻稗不至糟蹋浪费,树木花草有人管理照护,还节省了姑娘们头油脂粉的费用和请花匠、山子匠等人工费,连其余没有得到承包机会的人也有小利可分享。在这项大观园的新管理方案中,“节流”和“开源”都得到了实现,且各方都有好处,只剔除了买办和账房经手收支的中饱。

然而,探春的建议是在征求了王熙凤意见之后实施的。这项改革仅限于大观园,影响也只在姑娘和婆子、丫鬟等。此后,柳五儿被扣留、林之孝家的提出撵走彩儿妈这样的事,她就只能推向王熙凤或李纨身上。因为她知道自己的权限有多大,而且她只是暂时代管。此后不久,王熙凤病愈,重掌家务,贾府的一切又恢复如常,终致抄家破产,无可挽回。事实上,以探春自觉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人物基调来看(见第二十七回她与宝玉的对话)<sup>[3]370</sup>,身为贾府统治层的一员,她也不太可能真正触及所在阶层的实际利益,更何况,“如果这样的改革真正扩大到贾府的全面,那时就无可避免地和更多的贪污、腐朽发生冲突,探春所遇到的阻挠将不是什么吴新登媳妇和赵姨娘,也还不至于王熙凤,而是整个的贾府统治力量了。”<sup>[3]60-61</sup>换言之,即便探春兴利除弊的范围能扩大,但却要面临更大的阻力,其改革注定也不能彻底而必然要走向失败的命运。

因为生逢“末世”,王熙凤和探春是不幸的,然而也正是“末世”才造就了王熙凤这样“奸雄”式的人物,也令探春力挽狂澜的“救世”行为更具悲剧性。王熙凤和探春的管理方案恰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如果说悲剧是人生价值的毁灭,那么《红楼梦》描述的“末世”则

几乎毁灭了所有的价值和人生,包括王熙凤和探春的。只是王熙凤的悲剧源于权力和财富欲望的幻灭,而探春的悲剧则更像是危机四伏的“末世”之下一曲扣人心弦的华彩乐章,带有悲壮的意味。

### 三、财货的分配占有与欲望下的人物关系、家庭矛盾

《红楼梦》被认为是中国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涉及欲望与形而上问题思考的小说<sup>[8]</sup>。尽管其人物塑造的巨大成功常令人有事件和局面实为人物性格而设的“错觉”,但总体上看,《红楼梦》仍然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以情节为叙事结构中心的传统。其中,财货的分配、占有,显然是《红楼梦》故事情节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塑造人物性格、构建人际关系、描绘家庭矛盾的重要手段。小说中的人物或压迫或反抗、或享乐或哀愁、或诱惑或挣扎、或拥有或匮乏……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尖锐的家庭矛盾均与欲望和需求有关。

从主客体关系考虑,经济活动的实质是人类的涉物行为。《红楼梦》有关财货的分配占有问题最集中地体现于月钱叙事中。所谓“月钱”,就是贾府按身份等级,给府中上下人(包括主子 and 奴才)按月分配的零花钱。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有关月钱的情节或细节描写,充分凸显了金钱与地位、需求与欲望等有关的隐喻与象征。

王熙凤作为小说着力较深的核心人物,是婆媳、夫妻、妯娌、主仆等各类人物关系的交叉点,也是贾府长辈、平辈、小辈、本家、亲戚和男女之间多元矛盾的聚焦处。她是贾母、王夫人跟前的“红人”、荣国府的实际管家,但也是府里不少人尤其是下人抱怨、嫉恨的对象。其中一大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贪欲极强的她利用自己治家的权力,长期挪用众人的月钱放贷。《红楼梦》第三回黛玉初进贾府,就见王夫人问凤姐:“月钱放过了不曾?”<sup>[3]41</sup>这其实是为后文写王熙凤拖延月钱发放埋下伏笔。其后第三十九回,袭人向平儿打听:“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和太太还没放呢,是为什么?”<sup>[3]520</sup>于是,小说借平儿之口第一次提及王熙凤提前支取众人月钱放贷的信息:“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放出去,只他这梯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

呢。”<sup>[3]520-521</sup>第五十五回记探春等人暂行管家职权,秋纹前往欲询问:“宝玉的月银我们的月钱多早晚才领。”<sup>[3]757</sup>如此种种,可见王熙凤拖延发放月钱的行迹已十分明显。小说里通过这两次“打听”以及第十一回、十六回、三十九回有关旺儿夫妇送利钱的细节,大致勾勒出王熙凤放贷事件的“冰山”一角。尽管《红楼梦》并没有正面叙述府中众人是否知道内中隐情,但透过第二十五回赵姨娘的抱怨、第三十六回王夫人询问月钱发放情况及第六十五回兴儿向尤二姐抱怨凤姐“恨不得把银子钱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她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讨好儿”<sup>[3]912</sup>,可知贾府人私下都在怀疑凤姐贪污公款、克扣下人的月钱,大家对她的治家行为深为不满。《红楼梦》有关王熙凤拖延发放时间、挪用月钱放贷的叙事,“是暗写,是侧面写,常常是从对话中用几句话轻轻地点出来,一带而过,但份量却不轻,关系十分重要。”<sup>[9]</sup>这一“草蛇灰线”的叙事,不仅为贾府最终被抄家的情节“伏脉千里”,也从一个侧面刻画了王熙凤极善聚敛的性格。

很多时候,家庭矛盾显露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经济地位的不平衡和经济利益的博弈,隐藏在暗处的则是各种人物的欲望。陈大康先生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大多有经济利益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位置,它是各人物思想、言语、行动以及人物间相处准则的重要决定因素,书中这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无处不在。”<sup>[10]</sup>在描写王熙凤与平辈的李纨和尤氏的妯娌关系及矛盾时,财物的分配叙事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十三回,贾母为凤姐凑份子过生日,她在贾母等面前口头应承替李纨出份子,背地里又赖账,甚至连最卑下穷苦的赵姨娘、周姨娘的钱也不肯放过。尤氏由于不满凤姐“作弊”且平日里对下克扣过分,把已经收齐了的平儿、鸳鸯以及赵姨娘、周姨娘的份子钱都退还了她们本人。当着凤姐的面,尤氏毫不避讳地对着平儿讽刺说:“我看着你主子这么细致,弄这些钱那里使去!使不了,明儿带了棺材里使去。”<sup>[3]579</sup>

如果说尤氏对凤姐嫉妒不满还较为显性,那么李纨和凤姐的关系则相对隐性。小说中有关李、王二人仅有的一次正面“交锋”也是关于月钱的。第四十五回,大观园姊妹们欲办诗社,李纨带领

大家找王熙凤索要活动经费,无意中触动了凤姐的“心事”。她算账一般历数了李纨的收入:

老太太、太太罢了,原是老封君。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银子。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又有个小子,足的又添了十两,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给你园子地,各人取租子。年终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儿。你娘儿们,主子奴才共总没十个人,吃的穿的仍旧是官中的。一年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sup>[3]599</sup>。

这番话虽然是用玩笑的口吻说出,但王熙凤对李纨的嫉妒和不满还是相当明显的,原因在于同为贾府孙辈儿媳,两人在月钱上的待遇十分悬殊。王熙凤的月钱不足十两,而李纨因为贾母等认为她是寡妇带着孩子过活,月钱就提升到了二十两,此外还有“独一份”的园子地租。家庭成员间地位、处境的不同造成了财务分配和占有的不均,也在一定程度上生发或激化了家庭矛盾。王熙凤对他人的收入情况了如指掌,并非仅缘于她持家的角色,更源于她深细的心机和婪取钱财的强烈欲望。

除李纨这一特殊个例外,封建家庭内部的经济分配基本上依照宗法家庭的等级秩序进行,因此,《红楼梦》中有关月钱等财货分配的叙事,又无形中承担起相应的意义传达作用。然而,人为的秩序并不能有效地控制欲望,反而激起更强烈的欲求,引发更尖锐的矛盾。赵姨娘是《红楼梦》中既可怜又无法令人同情的人物之一。她顶着“姨奶奶”的名义,在贾府有着半主子半奴才的尴尬身份。她虽然替贾政生了一儿一女,但实际地位并不高。这一点从她的月钱数量就能看出来。从第三十九回可以得知,王夫人的月例是二十两,而赵姨娘只有二两,在月钱的数量上同自己的儿子贾环等贾府未婚孙辈处于一个等级。甚至连袭人这样未对外明言的通房大丫鬟也与她同等待遇。第二十五回马道婆造访赵姨娘,见她正在粘鞋。面对一堆零碎绸缎,赵姨娘抱怨说:“你瞧瞧那里头,还有那一块是成样的?成了样的东西,也不能到我手里来!”<sup>[3]339</sup>难以想象,作为家主贾政“跟前人”出身的侍妾,赵姨娘竟穷困至如此地步。于是,财货的分配不均便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受人抑制的仇恨和夺取统治地位的野心,加上那专以害人为业的马道婆的怂恿、设计,便制出



了赵姨娘的杀机。”<sup>[7]97</sup>为了让马道婆弄法除掉王熙凤和宝玉,赵姨娘不仅倾其所有——自己的衣服首饰、散碎银子,还另写了一张五百两的欠银字契。身份的卑微与经济地位的低下,令不甘雌伏的她嫉妒嫡出的宝玉,对当权的凤姐心怀不满,甚至与亲生女儿也矛盾不断。第五十五回,赵国基死了,为了讨要更多的抚恤费,赵姨娘去责怨暂理管家权的探春:

我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又有你和你兄弟,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连你也没脸面,别说我了!……你只顾讨太太的疼,就把我们忘了。……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明日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如今没有长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sup>[3]751-752</sup>

这番话无疑戳中了探春心中最深的痛点,激化了她和亲生母亲之间的矛盾,她因此大发脾气。因为心志甚高的她偏偏是从卑贱的赵姨娘肚子里诞生出来的,“她从在娘胎里就被注定了和自己生身之母身份地位的矛盾”,“年纪越长,这种矛盾感觉越明显”<sup>[7]63</sup>。再加上赵姨娘品性恶劣,常惹纠纷,为众人所不齿,更促使探春从宗法家庭正统主义的伦理出发,抛弃生身的血统而承认王夫人才是母亲<sup>[3]370</sup>,坚决维护自己的“尊严”。《红楼梦》中类似与欲望和经济利益有关的矛盾——围绕财产继承和现实金钱支配的明争暗斗还很多,如贾璉与王熙凤、邢大舅与邢夫人、迎春与其乳母、芳官与其干娘之间,且交叉于各类人际关系,如亲戚、主仆与仆人之间。所以,探春才会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sup>[3]1042</sup>

在宗法制家庭中,位尊的当权者掌握着家庭的权柄,也把控着财货调配的权力,他们可以任意赏赐,也可以随意剥夺。财物成了他们平衡矛盾的工具或施威的手段,也在叙事中获得特别的意义。如王夫人看重宝玉屋里的大丫鬟袭人,有心笼络和栽培她为宝玉身边最可信赖的“自己人”,便在月钱等物质方面予以优待。袭人原是贾母的丫鬟,每月一两银子的月例。王夫人不仅专门命

人赏菜给袭人吃<sup>[3]371</sup>,还不惜从自己的月例里每月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给她,赋予其近乎“姨奶奶”的特殊身份<sup>[3]476</sup>。金钏因被打受辱投井自尽,王夫人为平息自己内心对金钏的愧疚,也为了平衡因此事可能带来的矛盾,让金钏的妹妹玉钏拿双份月钱。又如,贾珍是宁国府的当家人,他可以恣意挥霍、寻欢作乐,在父丧中大规模聚赌,但年终发放年物的时候又摆出一副族长的面孔装正经,毫不留情地训斥、羞辱并赶走前来领年物的贾芹<sup>[3]722</sup>。

经济以人为中心,与人的生活、追求密切相关。文学是一种精神生产,意义的生成、思想的传达是其终极旨归。透过《红楼梦》的经济叙事,可以更深刻地审视人与物的关系,捕捉到欲望与幻灭的深层寓意,从而把握作品的题旨。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作品,《红楼梦》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手法,通过经济“衰败”搭建了小说的整体叙事框架,预示了贾府所代表贵族阶级败亡的必然趋势,又以“末世”的图景凸显了人物性格及命运,还以财货的分配占有写出了欲望推动下的人际关系和家庭矛盾,完成了意义的传达。

#### 参考文献:

- [1] 刘再复. 红楼哲学笔记 [M]. 香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3-4.
- [2] 吕启祥, 林东海. 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 [G].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 [3] 曹雪芹, 无名氏. 红楼梦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 [4] 杨义. 中国叙事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41.
- [5] 邓云乡. 红楼梦导读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43-44.
- [6] 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94.
- [7] 王昆仑. 红楼梦人物论 [M]. 2版.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
- [8] 赵炎秋. 文化与文学: 中西叙事思想比较研究管窥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1): 5.
- [9] 邓云乡. 红楼识小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64.
- [10] 陈大康. 荣国府的经济账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1-2.

责任编辑: 黄声波